

愛與衝突：浪漫衝突影響旅遊目的地 未來旅行意向的機制研究

李 夏 張偉藝 李 攀 唐 娟

（澳門科技大學，澳門）

摘 要：本研究從關係動態視角切入，探討伴侶旅行這一高強度互動情境中的矛盾處理及其後續影響。儘管共同旅行常被視為增進關係的機會，但旅途摩擦可能轉化為“關係壓力源”，其效應會延伸至旅行後的行為意向。目前，衝突如何具體影響伴侶對目的地的未來旅行意向，尚缺乏清晰解釋。為回應此問題，本研究提出，衝突通過雙路徑影響未來旅行意向：一是即時情緒路徑，即衝突引發的不愉快感直接降低其未來旅行意向；二是長期關係路徑，即衝突激發特定於當前伴侶的依戀焦慮，從而削弱未來的旅行意向。研究同時假設，個體的神經質特質會強化上述路徑。通過對 417 個中國被調研者的配對數據進行分析，使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檢驗，研究結果支持了假設。衝突通過情緒與關係安全雙重中介間接降低未來旅行意向，且神經質人格正向調節該中介效應。本研究揭示了浪漫衝突影響未來行為的情感與認知雙路徑機制，並明確了人格特質的邊界作用。實踐上，建議旅遊業者關注伴侶遊客的關係動態，為旅遊業如何有效管理與賦能這一特殊的“關係進程型消費”提供了範式轉換的路徑。

關鍵詞：浪漫旅行；浪漫衝突；不愉快感；特定關係依戀焦慮；情感溢出理論；依戀理論；未來旅行意向

中圖分類號：F59

作者簡介：李夏，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偉藝，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攀，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唐娟（通訊作者），博士，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副教授。

Love and Conflict: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Romantic Conflict Affecting the Future Travel Intention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Li Xia Zhang Weiyi Li Pan Tang Jua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anagement of conflicts and their subsequent impacts within the high- intensity interactive context of romantic tourism, from a dynamic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While travel is often viewed as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relationships, travel- related conflict can become a “relationship stressor”, with effects extending to post- trip behavioral intentions. Currently, the specific impact of conflict on couples’ willingness to revisit a destination remains unclear.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conflict influences future travel intentions through two pathways: first, the emotional evaluation pathway, where unpleasant feelings triggered by conflict directly reduce future travel intentions; and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security pathway, where conflict induces attachment anxiety to the current specific partner, thereby weakening future travel intentions. The study also hypothesizes that an individual’ s neuroticism traits amplify these pathways. Analysis of paired data from 417 Chinese sample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 supports these hypotheses. Conflict indirectly reduces future travel intentions through the dual mediation of emotion and relationship security, with neuroticism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is mediating effec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ual- pathway mechanism by which tourism conflict influences future behavior and clarifi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traits. Practica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ourism operators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s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provide a paradigm shift path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effectively manage and empower this unique “relationship- process- based consumption”.

Key words: romantic tourism; romantic conflict; unpleasantness; relationship- specific attachment anxiety; Affect Spillover Theory; Attachment Theory; future travel intention

引言

在當前旅遊研究中,伴侶共同旅行被視為一個持續增長且具有重要商業價值的細分市場。據 Minor Hotels Travel Trends Report(2026)統計,約 66% 的受訪者選擇伴侶作為最常見的旅伴;Global Growth Insights (2026)的報告進一步指出,全球浪漫旅遊

市場規模預計將從 2024 年的約 18.3 億美元增長至 2033 年的約 129.1 億美元,期間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 24.2%。這些數據共同印證了該市場顯著的普遍性與增長潛力。

儘管伴侶旅行常被賦予增進親密與創造美好記憶的積極期待(Lee, et al., 2020) ,但現實觀察表明,其也可能伴隨顯著的交往壓力與關係風險。旅行中因決策協商與持續互動所引發的浪漫衝突並不少見,甚至可

能對關係穩定性構成威脅。例如騰訊谷雨數據(2021)針對 11,000 名參與者的調查顯示,不少伴侶在旅行結束後選擇分手。此類現象提示,浪漫旅行具有明顯的雙面性:既可能是關係深化的契機,也可能成為衝突激化與負面情緒(如恐懼、悲傷)的誘發情境(Servidio & Ruffolo, 2016)。浪漫旅行中的衝突本質上是關係內部事件,但其影響卻可能超越關係邊界,波及對旅行本身的評價與記憶。既有研究多聚焦於旅行的積極面向,對衝突如何通過心理機制影響後續旅遊決策的探討尚不充分(Coffey, et al., 2024; Li, et al., 2021)。

為深化此方面的理解,基於 Hagen 等人(2023)與 Murray 等人(2003)的界定,本研究引入依戀理論與情感溢出理論(Affect Spillover Theory),構建一個雙路徑解釋模型。具體而言,本研究提出,旅途中的浪漫衝突——可概念化為伴侶間的負面行為與感知到的拒絕兩類相關表現——並不會直接轉化為對目的地的回避意向。相反,其影響主要通過兩條並行心理路徑實現:一是激發即時的、情境性的負面情感體驗(不愉快感);二是激活個體對當前關係安全性的長期擔憂(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前者依據情感溢出理論(Antonetti & Valor, 2021),認為衝突引發的負情緒會“溢出”並污染對整體旅程及目的地的評價及後續的行為意圖;後者則基於依戀理論,指出在高度情感投入的旅行情境中,衝突易被解讀為關係威脅,從而動搖個體的關係安全感,進而影響其未來共享活動的意願。進一步地,本研究認為個體穩定的神經質人格特質會強化上述機制。高神經質個體對壓力與關係信號更為敏感,

因此在經歷衝突後,其情感反應與焦慮水平更為強烈,導致重遊意願的下降也更為顯著。

本文在以下方面推進相關領域的認識:首先,通過對浪漫衝突進行二維度概念化,深化對其在旅遊情境中複雜表現的理解;其次,通過揭示“不愉快感”與“特定關係依戀焦慮”這兩條並行中介路徑,系統闡釋浪漫衝突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內在心理過程;最後,通過檢驗神經質人格的調節作用,明確上述機制生效的個體邊界條件。這些結論不僅拓展了浪漫旅遊研究的理論視野,也為目的地及服務業者設計關係敏感型服務、實施客群風險細分提供了實證依據。

1 文獻綜述與概念模型

1.1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1 情感溢出理論與依戀理論

情感溢出理論最初源於組織行為學對工作與家庭界面交互影響的研究(Bolger, et al., 1989),但其核心邏輯——情感狀態跨越情境邊界影響認知與行為,同樣適用於浪漫旅行情境。在旅遊研究領域,該理論已被用於解釋遊客對服務接觸或目的地環境的負面評價如何泛化至整體旅程滿意度和行為意向(Baah & Kim, 2025)。然而,現有研究在運用該理論時,大多將情感溢出視為個體對外部旅遊刺激的反應,忽視了旅遊活動本身作為一種高強度社會互動情境所蘊含的內部情感動態。具體而言,當前文獻缺乏對旅遊過程中伴侶間情緒互動及其溢出效應的深入探討。伴侶在共同決策、資源分配及日常互動中產生的負面情緒(如不滿、沮喪

或焦慮),往往具有人際關聯性與時間持續性(Saini, et al., 2024)。這類源於關係內部的情感不僅會影響雙方即時的互動質量,更可能通過認知與記憶機制,持續作用於後續行程體驗乃至結束旅行後的目的地評價與重遊意願(Verfuert & Gregory - Smith, 2018; Antonetti & Valor, 2021)。本研究提出,浪漫旅行中的情感溢出呈現從人際到空間的雙層傳導:第一層,衝突引發的情緒(不愉快感)從對伴侶的不滿,泛化至對共同所處環境的不滿;第二層,衝突激發的關係擔憂(依戀焦慮)從對關係安全的疑慮,兩層關係均延伸至對可能重現該情境的共同活動(重遊目的地)的迴避。這一理論延伸得到了近期研究的支持:Saini 等人(2024)發現伴侶間的日常衝突會泛化至共同財務決策領域;Antonetti 與 Valor(2021)則證實,人際情境中產生的離散情感(如憤怒)具有跨情境的溢出效應。本研究在此基礎上,首次將情感溢出理論系統應用於浪漫旅遊的人際關係到目的地本身的影響鏈。

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自 Bowlby(1969)提出以來,已由發展心理學逐步拓展為理解個體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情感聯結與壓力應對的元理論。尤其指出,其在成人親密關係中的應用(Hazan & Shaver, 1987),依戀焦慮維度高的個體對關係威脅高度敏感,容易在衝突中體驗到強烈的被棄恐懼與情緒困擾(Mikulincer & Shaver, 2016)。然而,現有旅遊研究多聚焦於“人一地”依戀,對伴侶之間人際依戀的關注明顯不足,尤其缺乏對旅遊衝突所激發的狀態性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及其後續影響的探討。相關研究大多僅停留在將其視為穩定特質,

考察其與旅行滿意度的相關性(Li, et al., 2024)。一個重要且尚未解答的研究問題是:在旅行這一獨特的高壓情境下,伴侶衝突所即時激發的特定關係依戀焦慮(Fraley, et al., 2011),是否構成衝突阻礙未來旅行意向決策的關鍵中介機制?

為系統彌補上述理論缺口,本研究構建一個並行的雙中介模型。以浪漫旅行中的伴侶衝突為起點,同時引入不愉快感作為情感溢出路徑的中介變量,以及特定關係依戀焦慮作為依戀路徑的中介變量,旨在從理論層面區分並實證檢驗浪漫衝突影響伴侶未來旅行意向的兩條並行機制-“情緒性代價”與“關係性風險”。

1.1.2 浪漫旅遊中情感衝突及未來旅行意向

浪漫旅遊研究在近年呈現出顯著的理論深化與視角轉向。早期研究多聚焦於跨越文化界限的短暫浪漫邂逅,而當前學界則日益關注旅遊作為親密關係動態演變的重要情境(Carter & Li, 2023)。這一轉向標誌著該領域從描繪現象轉向剖析旅遊中的情感互動與關係再生產機制。儘管作為浪漫旅遊子類的蜜月旅行已被廣泛研究,但其高度儀式化的消費特徵導致相關討論多局限於市場層面,未能充分揭示旅行對伴侶關係質量的長效影響機制。當代理論將浪漫旅遊重新定義為一種關係情感動態過程。它通過共享的、脫離日常的時空體驗,為伴侶提供了獨特的“關係實驗室”,既是鞏固情感聯結、構建共同敘事的場域,也必然是應對壓力與分歧的挑戰情境。由於旅程中伴侶處於密集共處與高期望值之下,原本細微的差異容易被放大,使得情感衝突成為理解

旅遊體驗與關係結果的核心分析單元。

為釐清衝突的內在機制,本研究借鑒並拓展了關係自尊理論(Murray, et al., 2003)。該理論認為,衝突的根源在於個體感知到其應得的尊重與關懷受到威脅,這種感知觸發了內在的“情感”警報。當個體(尤其是關係安全感較低者)將伴侶言行解讀為拒絕信號時,會啟動“感知威脅-自尊受損-負面應對”的循環。近期研究進一步指出,此類衝突在旅遊這一高壓、高互動情境中,其頻率與強度可能被系統性放大(Winterheld & Simpson, 2011)。據此,本研究將浪漫衝突概念化為一種關係壓力源(Relational Stressor),它不僅是行為層面的爭執,更是一種能夠觸發連鎖心理反應的關係事件。

然而,現有文獻對“浪漫衝突”的操作化定義常混同了外顯的對抗行為與內在的威脅感知,制約了精準的機制分析。為此,本研究提出一個聚焦於互動序列的分析框架,將浪漫衝突概念化為一個解釋-反應循環:它始於一方對伴侶言行作出“負面意圖歸因”(即感知到關係威脅),這種主觀感知隨即引發情緒痛苦與防衛動機,並外顯為回避、指責等拒絕行為。因此,區分“感知到的伴侶負面行為”與“自身實施的拒絕行為”至關重要,前者是觸發循環的認知評估,後者則是維持並升級衝突的行為反饋。這一區分有助於更精細地揭示衝突從感知到行為演化的動態過程,為後續的實證檢驗與干預策略設計提供清晰的理論基礎。

未來旅行意向是旅遊行為研究中的關鍵因變量,反映個體再次到訪或推薦某一目的地的心理傾向(Jalilvand, et al., 2012)。在伴侶共同旅遊的情境下,該意向更集中體

現了雙方的關係承諾、共享意願以及對未來關係的信心。既有研究多從宏觀營銷角度或總體體驗評價預測未來旅行意向,相對忽略了伴侶間微觀互動這類直接且情感化的前因變量。本研究將未來旅行意向作為結果變量,旨在構建從“瞬間衝突”到“長遠旅遊決策”的完整解釋路徑。

那麼,浪漫衝突作為關係壓力源,為何會影響未來旅行意向?本研究認為,其核心邏輯在於“心理表徵的轉變”:衝突改變了個體對“與伴侶共同旅行”這一活動的心理表徵——原本與積極情感聯結的活動,現在可能與負面情緒和關係擔憂形成聯結。而這一轉變的實現,恰恰依賴於情感溢出機制的作用:根據情感溢出理論的基本邏輯,個體在某一領域產生的負面體驗會跨越情境邊界,影響其對其他相關對象的認知與評價(Bolger, et al., 1989)。在浪漫旅行情境中,目的地作為伴侶共同經歷的載體,自然成為負面情感的潛在投射對象。因此,當衝突發生時,與伴侶相關的負面體驗可能外溢至對目的地的感知,從而抑制重遊意願。這一推導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Hossain 等人(2023)發現旅遊中的負面互動事件會顯著降低遊客對目的地的整體評價;Saini 等人(2024)則證實伴侶間的日常衝突會泛化至共同財務決策等聯合活動領域。基於上述文獻,提出如下假設:

H1:浪漫衝突(包括感知的伴侶負面行為與自身的拒絕行為)對伴侶未來的旅行意向具有負向影響。

1.1.3 不愉快感和特定關係依戀焦慮的中介作用

基於情感在親密關係與消費決策間傳

遞的視角,本研究整合了情感溢出理論與依戀理論,旨在闡明浪漫旅行中的伴侶衝突影響其未來旅行意向的雙重心理路徑。核心論點是,衝突作為一種關係壓力事件,主要通過引發兩種性質不同的負面心理狀態,即時的情境性不愉快感與深層的特定關係依戀焦慮,來間接削弱重返目的地的意願。

首先,衝突會直接催生一種針對當前互動情境的瀰漫性負面情緒,即不愉快感。在旅遊研究中,不愉快感常被視為遊客對未達預期的服務或環境產生的直接負面情緒反應,並顯著影響其評價與行為意向(Hossain, et al., 2023)。本研究將此概念置於人際互動框架下重新審視:個體在與伴侶共同旅遊的衝突事件中,因衝突而針對伴侶所產生的消極情緒,具體表現為對伴侶的後悔、不快樂、失望與不滿等具體負向情感體驗,其初始對象往往是伴侶本人。但根據情感溢出理論的發展解釋(Chen, Zhang, & Cheng, 2023),這種源於人際的負面情緒並不會局限於關係內部,而是會附著於共享的旅行體驗上,並持續“污染”個體對目的地整體的認知與情感評價,最終導致未來旅行意向的降低。此即情感的溢出路徑。

其次,衝突還可能威脅到個體對關係本身的安全感,從而激發出更深層次的憂慮。這指向了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其概念源於依戀理論,特指個體在某一段具體親密關係中,對伴侶的可及性與回應性懷有的持續性擔憂(Fraley, et al., 2011)。旅遊情境具有空間封閉、決策密集與相互依賴性強等特點,這使其成為一個極易激活依戀系統的“高載荷”環境(Zheng, et al., 2024)。在此環境中,爭吵或冷戰等衝突行為更容易被個

體解讀為關係不安全的信號,從而觸發“我是否會被拋棄/拒絕”的特定焦慮。這種焦慮超越了當下不快的情緒,動搖的是對關係未來的信心,進而使個體對再次進入可能引發類似壓力的共同旅行情境(如重遊同一目的地)產生根本性的回避動機。此即關係的安全威脅路徑。

由此可見,伴侶間的旅行衝突對行為意向的影響,並非單一的情緒傳導過程,而是包含了即時情感評價與長期關係感知的雙路徑機制。二者雖可能同時被激活,但在理論上代表了從表層情感到深層關係認知的不同作用層次。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並行中介假設:

H2:不愉快感在浪漫衝突與伴侶未來旅行意向之間起中介作用。

H3: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在浪漫衝突與伴侶未來旅行意向之間起中介作用。

1.1.4 神經質人格

神經質作為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的核心維度之一,長期以來被定義為個體體驗負面情緒的傾向性,其特徵包括情緒不穩定性、壓力易感性、焦慮、抑鬱傾向以及對威脅的過度警覺(Costa & McCrae, 1992; John & Srivastava, 1999)。該特質被廣泛視為一種關鍵的個人“脆弱性素質”,預示著個體在面對逆境時更可能產生消極的心理與行為後果(Monroe & Simons, 1991)。高神經質個體通常表現出較差的情緒調節能力,對負面刺激的信息加工存在偏向,並傾向於對模糊情境做出威脅性解讀(Soto & John, 2017)。

儘管神經質在基礎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已非常廣泛,但其在旅遊研究

中的應用卻顯著滯後與零散。現有文獻多集中於開放性、外向性或盡責性等特質對旅行偏好、目的地選擇或冒險行為的預測 (McCabe & Johnson, 2013)。僅有少數研究開始關注神經質在旅遊情境中的作用,但焦點往往局限於其對“前期”旅行擔憂、旅行方式選擇或一般性旅行壓力感知的影響 (Larsen, 2007)。本研究進一步追問:神經質如何調節浪漫衝突對未來旅行意向的間接影響機制?

高神經質個體對負面刺激的情緒反應更為強烈,對衝突引發的不愉快感體驗更為敏感 (Soto & John, 2017)。在相同的衝突情境下,高神經質個體所體驗到的不愉快感強度顯著高於低神經質個體。這意味著,衝突通過不愉快感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間接效應,在高神經質個體身上會被放大。高神經質個體不僅情緒反應強烈,對關係信號的解讀也更具威脅傾向 (McNulty, 2008)。在衝突情境中,他們更容易將伴侶的言行解讀為拒絕或拋棄的信號,從而更容易激活對關係安全的擔憂,即特定關係依戀焦慮的水平更高。Mikulincer 與 Shaver (2016) 指出,高神經質個體與依戀焦慮存在正向關聯。這意味著,衝突通過依戀焦慮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間接效應,在高神經質個體身上同樣會被放大。

綜上所述,神經質人格會系統性地強化浪漫衝突對未來旅行意向的間接負面影響——既放大情感溢出路徑(通過增強不愉快感),也放大關係安全路徑(通過增強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基於上述推導,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4:神經質人格正向調節浪漫衝突通

過不愉快感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中介路徑。即相較於低神經質個體,高神經質個體的該間接效應更強。

H5:神經質人格正向調節浪漫衝突通過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中介路徑。即相較於低神經質個體,高神經質個體的該間接效應更強。

1.2 概念模型

綜上所述,本研究構建了浪漫衝突對未來旅行意向的雙中介模型。模型清晰地勾勒了兩條“人際摩擦”向“人地疏離”轉化的路徑:路徑 A(情感溢出路徑),即衝突引發瀰漫性的“旅途不愉快感”,這種情緒間接抑制未來旅行意向;路徑 B(關係安全路徑),即衝突激活了對當前關係的依戀焦慮,使得“重遊故地”在心理上被解讀為“重溫衝突情境”或“冒險進入關係高壓區”,從而觸發迴避動機。且通過納入神經質這一穩定的人格特質作為調節變量,強調了個體差異並明確了浪漫衝突的負面影響存在顯著的個體邊界,回應了“衝突對誰影響更大”的關鍵問題。最終建立了如圖 1 所示的完整邏輯鏈條。

2 研究設計

2.1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回溯性問卷調查法探究浪漫衝突對個體未來旅行意向的影響,並進一步檢驗不愉快感與特定關係依戀焦慮的中介作用,以及神經質人格在其中的調節效應。本研究聚焦於休閒型旅遊情境,包括城市觀光旅遊、自然景區旅遊及綜合度假型目

的地。問卷說明中明確要求受訪者回憶最近一次與戀愛伴侶進行的休閒旅遊經歷,並以該具體旅行作為回答參照情境。在伴侶關係界定方面,本研究所指“伴侶”包括處於穩定情感關係中的情侶與已婚配偶,但不包括普通朋友或曖昧對象。衝突情境方面,本研究將“浪漫衝突”界定為旅行期間雙方在決策、行為或情緒互動中產生的顯性矛盾

或爭吵,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類型:行程安排與活動選擇分歧;消費與預算分歧;時間安排與遲到問題;社交互動(如與他人互動)引發的不滿;情緒表達與溝通方式衝突等。問卷中明確要求受訪者回憶一次“在旅行過程中發生明顯矛盾或爭吵的情境”,並基於該具體衝突事件進行後續題項評估,以增強情境一致性與測量精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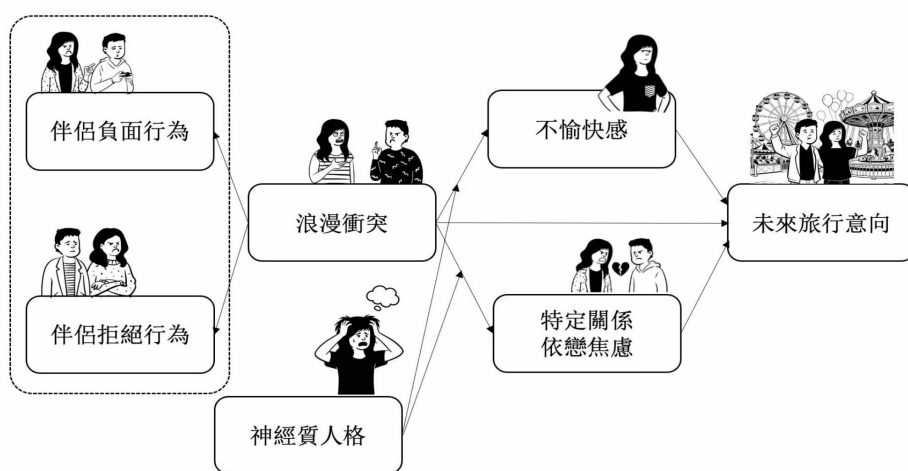


圖 1 浪漫衝突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概念模型

問卷採用李克特 7 點量表設計(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問卷架構包含六個主要部分:(1)人口統計特徵(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2)浪漫衝突(12 個題項):本研究對 Murray 等(2003)以及 Hagen 等(2023)開發的量表題項進行改編,從伴侶負面行為與自身拒絕行為兩個角度衡量共同出遊情境中的衝突體驗;(3)不愉快感(4 個題項):參考 Prayag 等(2013)的測量量表,衡量因衝突引發的消極情緒反應;(4)特定關係依戀焦慮(4 個題項):參考 Fraley 等(2011)和 Snyder 等(2024)的測量量表,評估個體對伴侶關係的不安全感與擔憂;(5)神經質人格(12 個題項):參考 Soto 和 John(2017)的測量量表測量情緒波動、焦慮傾向等特徵;(6)未來旅行意向(3

個題項):參考 Jalilvand(2012)的測量量表,從再次出遊可能性、計劃性與推薦傾向等方面衡量未來重訪目的地的行為意向。整體而言,本研究問卷設計以成熟量表為基礎並結合共同旅遊情境進行適配,通過系統性數據收集與後續 PLS- SEM 分析以揭示變量間的作用機制與路徑關係。

2.2 數據收集

研究數據採用線上問卷調查方式收集。問卷通過問卷星平台製作,並借助社交媒體與線上社群渠道進行投放與擴散,同時採用便利抽樣與滾雪球方式邀請符合條件的受訪者參與填寫。為確保樣本符合研究情境,正式量表前設置兩道篩選題:“你是否曾與戀愛伴侶一同進行休閒旅遊?”“你是否在

該次旅行過程中與伴侶發生過明顯矛盾或爭吵?”。僅當兩題均回答“是”的受訪者方可進入正式問卷。

數據收集時間為 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2 月 8 日,共回收問卷 464 份。問卷回收後,研究人員依據預設的質量控制標準對數據進行清理,剔除作答時長異常短、同一選項長串作答、存在明顯隨意作答特徵、關鍵信息缺失或邏輯矛盾等無效問卷,以確保數據的可靠性與可用性。經篩選與清理後,最終獲得 417 份有效問卷用於後續統計分析。本研究共包含 35 個測量題項,有效樣本量($n=417$)約為題項數量的 11.9 倍,滿足 PLS- SEM 分析對樣本量需要大於題項數量 10 倍的基本要求(Hair, et al., 2017)。人口統計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人口統計特徵

類別	類型	頻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85	44.3
	女	232	55.7
年齡	18~25 歲	49	11.8
	26~35 歲	159	38.1
	36~45 歲	111	26.6
	46~55 歲	67	16.1
	55 歲以上	32	7.7
	初中及以下	8	1.9
受教育水平	高中	29	7.0
	大專	131	31.4
	本科	206	49.4
	碩士及以上	43	10.3

3 數據分析及結果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4.0 進行偏最小二乘結構方程模型(PLS- SEM)分析,並使用 Bootstrapping 5000 次重複抽樣方法檢驗

路徑系數的顯著性與中介/調節效應。依據 Hair et al.(2019)建議的兩階段評估程序,即先評估測量模型的信度效度,再檢驗結構模型的路徑關係與解釋力。

3.1 信度與效度

表 2 展示了本研究測量模型的信度與收斂效度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各測量題項在其所屬構念上的因子載荷均高於 0.70,範圍介於 0.777 ~ 0.868,表明各指標對潛變量具有良好的解釋力。各構念的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0.828 ~ 0.953 之間,均高於 0.70 的推薦閾值,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同時,組合信度(CR)介於 0.897 ~ 0.959 之間,均超過 0.70 的標準,進一步支持測量工具的信度水平。在收斂效度方面,各構念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介於 0.659 ~ 0.744 之間,均高於 0.50 的建議標準,表明潛變量能夠解釋其測量指標的大部分變異,具備良好的收斂效度。

在區分效度檢驗方面,本研究同時採用 Fornell 與 Larcker(1981)提出的判準以及異質特質 - 同質方法比率(Heterotrait - Monotrait ratio, HTMT)進行評估。Fornell - Larcker 檢驗結果(見表 3)顯示,各構念 AVE 的平方根(對角線值)均大於其與其他構念之間的相關係數,表明構念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此外,HTMT 檢驗結果(見表 4)顯示,所有構念之間的 HTMT 值介於 0.384 ~ 0.513 之間,均低於 0.85 的保守閾值,進一步驗證了本研究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 2 信度與效度檢驗

變量	因子載荷	Cronbach's α	CR	AVE
浪漫衝突(RC)				
伴侶負面行為(PNB)		0.924	0.939	0.688
PNB1	0.818			
PNB2	0.836			
PNB3	0.835			
PNB4	0.835			
PNB5	0.819			
PNB6	0.838			
PNB7	0.825			
伴侶拒絕行為(PRB)		0.884	0.915	0.683
PRB1	0.812			
PRB2	0.829			
PRB3	0.824			
PRB4	0.834			
PRB5	0.833			
特定關係依戀焦慮(RS)		0.858	0.904	0.702
RS1	0.832			
RS2	0.836			
RS3	0.853			
RS4	0.83			
不愉快感(UN)		0.864	0.907	0.71
UN1	0.832			
UN2	0.85			
UN3	0.838			
UN4	0.849			
神經質人格(NE)		0.953	0.959	0.659
NE1	0.799			
NE2	0.841			
NE3	0.829			
NE4	0.812			
NE5	0.816			
NE6	0.81			
NE7	0.795			
NE8	0.826			
NE9	0.811			
NE10	0.777			
NE11	0.801			
NE12	0.822			
未來旅行意向(FTI)		0.828	0.897	0.744
FTI1	0.868			
FTI2	0.862			
FTI3	0.858			

註:Cronbach's α 為內部一致性信度指標;CR 為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AVE 為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一般認為,Cronbach's α 與 CR 值大於 0.70 表示量表具有良好信度,AVE 值大於 0.50 表示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表 3 Fornell-Larcker 區分效度檢驗

變量	FTI	NE	PNB	PRB	RS	UN
FTI	0.863					
NE	-0.420	0.812				
PNB	-0.403	0.466	0.829			
PRB	-0.393	0.456	0.417	0.826		
RS	-0.324	0.389	0.373	0.373	0.838	
UN	-0.324	0.435	0.378	0.451	0.362	0.842

註：對角線上的粗體數值為各構念平均方差萃取量(AVE)的平方根。FTI=未來旅行意向,NE=神經質人格,PNB=伴侶負面行為,PRB=伴侶拒絕行為,RS=特定關係依戀焦慮,UN=不愉快感。

表 4 Heterotrait- Monotrait 相關係數檢驗

變量	FTI	NE	PNB	PRB	RS	UN
FTI						
NE	0.475					
PNB	0.471	0.512				
PRB	0.449	0.493	0.478			
RS	0.398	0.422	0.426	0.422		
UN	0.39	0.49	0.444	0.535	0.435	

註：FTI=未來旅行意向,NE=神經質人格,PNB=伴侶負面行為,PRB=伴侶拒絕行為,RS=特定關係依戀焦慮,UN=不愉快感。

3.2 結構模型檢測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浪漫衝突對個體未來旅行意向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beta = -0.370, t = 7.031, p < 0.001, 95\% CI [-0.470, -0.265]$),從而支持 H1。該結果表明,當個體在共同出遊過程中經歷更多的浪漫衝突時,其未來旅行意向顯著降低,說明親密關係中的衝突會直接削弱個體對再次出遊的意願。

進一步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不愉快感在浪漫衝突與未來旅行意向之間發揮顯著的中介作用($\beta = -0.042, t = 2.816, p = 0.005, 95\% CI [-0.075, -0.017]$),支持 H2。同時,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在浪漫衝突與未來旅行意向之間同樣呈現顯著的中介效應($\beta = -0.039, t = 2.663, p = 0.008, 95\% CI [-0.072, -0.015]$),從而驗證了

H3。綜合來看,浪漫衝突不僅會直接降低個體的未來旅行意向,還會通過增強不愉快感和特定關係依戀焦慮這兩條心理路徑,間接削弱其再次出遊的意願。

在調節中介效應方面,研究結果進一步表明,神經質人格顯著調節了浪漫衝突經由不愉快感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間接效應($\beta = -0.078, t = 3.727, p < 0.001, 95\% CI [-0.121, -0.039]$),從而支持 H4。如圖 2 所示,在高神經質人格水平下,浪漫衝突與不愉快感之間的正向關係更為顯著,而在低神經質人格水平下,該關係相對較弱,說明神經質人格會放大浪漫衝突對不愉快感的激發效應。此外,神經質人格同樣顯著調節了浪漫衝突經由特定關係依戀焦慮影響未來旅行意向的間接效應($\beta = -0.068, t = 3.319, p = 0.001, 95\% CI [-0.114, -0.034]$),驗證了 H5。如圖 3 所示,相較於

低神經質人格個體,高神經質人格個體在浪漫衝突增加時,其特定關係依戀焦慮上升幅度更大,從而使浪漫衝突通過該心理機制對未來旅行意向產生更強的負向影響。上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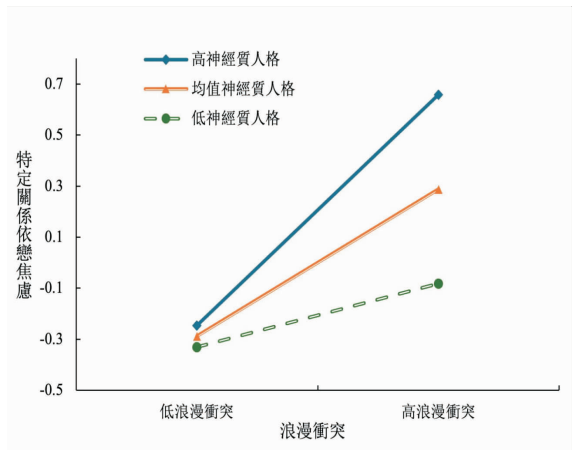


圖 2 神經質人格對浪漫衝突與不愉快感關係的調節作用

註:SD=Standard Deviation,表示標準差。線條表示在低(-1 SD)、平均值和高(+1 SD)神經質人格水平。

調節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與簡單斜率分析的可視化結果一致,各研究假設的檢驗結果匯總如表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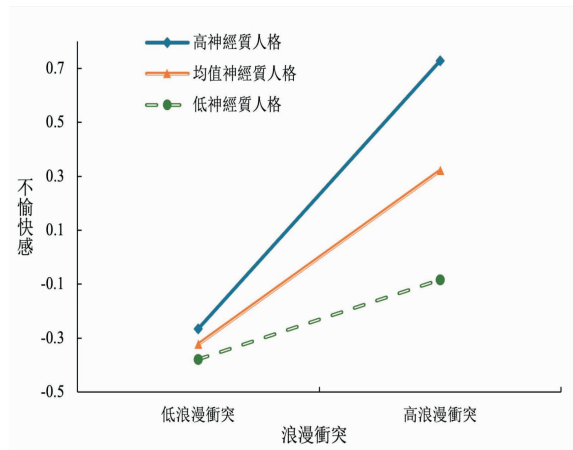


圖 3 神經質對浪漫衝突與特定關係依戀焦慮關係的調節作用

註:SD=Standard Deviation,表示標準差。線條表示在低(-1 SD)、平均值和高(+1 SD)神經質人格水平。

表 5 研究假設分析結果

假設	路徑	β	S.D.	t- value	p- value	LLCI	ULCI	結論
H1	RC→FTI	-0.370	0.053	7.031	0.000	-0.470	-0.265	成立
H2	RC→UN→FTI	-0.042	0.015	2.816	0.005	-0.075	-0.017	成立
H3	RC→RS→FTI	-0.039	0.015	2.663	0.008	-0.072	-0.015	成立
H4	NE×RC→UN→FTI	-0.078	0.021	3.727	0.000	-0.121	-0.039	成立
H5	NE×RC→RS→FTI	-0.068	0.021	3.319	0.001	-0.114	-0.034	成立

註: β 為標準化路徑系數,S.D.為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LLCI與ULCI分別表示95%置信區間的下限與上限,若置信區間不包含0,則表示效應顯著。FTI=未來旅行意向,NE=神經質人格,PNB=伴侶負面行為,PRB=伴侶拒絕行為,RS=特定關係依戀焦慮,UN=不愉快感。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 論

本研究通過情感溢出理論與依戀理論,揭示了伴侶浪漫旅行中的衝突對其後續共同決策的塑造機制。研究結果表明,此類衝突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種能夠啟動連鎖心理反應、並最終影響未來行為模式的關係性

壓力源。具體而言,研究驗證了一個包含雙重中介與一項邊界條件的理論模型。

從影響路徑來看,旅行中的情緒衝突主要通過兩條並行且相互關聯的通道發揮作用。首先,衝突會直接引發針對當下互動情境的負面情感評價(即不愉快感),這種即時性的情感反應會“附著”於對目的地的整體記憶之中,從而降低再度涉足該情境的意願(Hossain, et al., 2023)。其次,衝突可能被個

體解讀為關係不穩定的信號，進而激活其關係安全感知威脅（即特定關係依戀焦慮）。這種深層的擔憂涉及對伴侶可靠性與關係未來可持續性的懷疑，促使個體策略性地回避可能重現類似風險的情境（如重遊同一目的地）。更為關鍵的是，本研究發現個體特質在此心理傳導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調節角色。神經質人格特質，作為一種對負面刺激具有高度敏感性與情緒反應強度的穩定傾向，會顯著放大上述機制，這印證了個體差異在調節壓力事件心理後果中的重要作用（Larsen, 2007）。

綜上所述，本研究闡明了伴侶從“旅行衝突”到“共同行為回避”的完整作用鏈條：衝突作為誘發事件，通過激發表層情感評價與深層關係安全擔憂的雙重路徑影響決策，而個體的神經質水平則系統地調節了這一傳導過程的強度。

4.2 管理啟示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的實踐貢獻可被重新詮釋為：為旅遊業如何有效管理與賦能這一特殊的“關係進程型消費”提供了範式轉換的啟示路徑。

（1）區別於家庭遊的便捷或商務遊的效率，浪漫旅遊管理的核心矛盾在於：如何應對一個內在的、動態的關係過程。本研究揭示，衝突負面影響源於其對關係進程的“負面干預”。因此，對於目的地管理組織（DMO），管理的最高目標不應是營造一個無摩擦的虛假完美（這反而會放大心理落差），而是轉化為這段關係旅程的“積極協作者”與“情緒容器”。這意味著，服務設計需內置對關係動態的預見性與緩衝機制。例

如，旅行目的地可在行程中策略性設置“關係充電站”——如在密集的日程後安排無需決策的共享感官體驗（雙人 SPA、靜謐的觀景台），其目的不是景點打卡，而是為伴侶提供非言語的、恢復性的情感連接空間，主動預防衝突累積，將服務從被動的響應升級為前瞻性的關係營養供給。

（2）當前旅遊業的個性化服務多基於人口統計或行為偏好數據。然而，對於浪漫旅行而言，最具決定性的個性化維度是關係的實時狀態與個體的心理特質。本研究指出神經質人格的調節作用，這指向了“心理特質知情式服務”的必要性。在線旅遊平台（OTA）與旅行科技公司實踐可借鑒“人機交互”領域中的適應性界面設計理念，在合法合規與充分授權的前提下，於服務接觸的早期嵌入輕量級、遊戲化的關係互動診斷（例如，借鑒關係研究中的“共識感知”測量簡項）。系統可據此自適應地調整信息呈現方式（如為高焦慮傾向伴侶提供更清晰、分段式的日程說明）或推薦活動類型（如傾向於提供結構明確、不確定性低的雙人項目），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深度個性化。

（3）其他類型旅行的營銷可能強調新奇、奢華或放鬆，但浪漫旅遊的營銷敘事長期被困於“完美浪漫”的刻板想象，這反而製造了容易引發失望與衝突的心理預設。本研究的機制分析表明，衝突後的關係焦慮是抑制重遊的關鍵。因此，旅遊目的地營銷人員應公開承認並接納旅行中關係磨合的普遍性，將目的地品牌定位為見證與支持關係成長的“韌性夥伴”。這不僅能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預期壓力，更能在衝突發生時，將品牌角色從局外人轉變為有信任基礎的支持

者,從而將潛在的關係危機轉化為構建客戶長期情感依附與對於目的地的忠誠度。

4.3 理論貢獻與研究局限

本研究在理論層面具有以下貢獻:

(1)構建並驗證了一個整合性的雙路徑理論模型,首次將情感溢出理論與依戀理論共同置於浪漫旅遊這一具有時間緊湊、互動密集和象徵意義豐富等特點情境中進行對話(Liu, Li, & Xu, 2024)。該模型表明,伴侶衝突通過即時的情緒污染與深層的安全威脅雙重路徑影響行為意向,修正了傳統關係研究對特定情境因素的忽視,並為理解短期高強度共享體驗如何重塑關係與決策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2)揭示了神經質人格在旅遊衝突中的“風險增強”作用,為理解旅遊體驗的個體差異提供了重要補充。現有研究多側重於韌性、安全型依戀等特質帶來的積極適應(Smith & Diekmann, 2017),本研究則發現,在浪漫旅遊衝突的情境下,神經質特質會放大個體的情緒與關係焦慮,從而加劇衝突對後續行為意向的負面影響。這一發現豐富並平衡了旅遊體驗研究中側重於個人成長的視角(Larsen, 2007),這促使未來的理論構建必須更辯證地納入個體的人格特質,以形成更全面的解釋。

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但也為未來研究指明方向。首先,基於個體自陳數據的方法論設計,雖然清晰地揭示了個體內在的心理路徑,卻難以捕捉伴侶衝突中雙向、動態的互動序列與實時情感傳遞。未來研究可通過日記法、伴侶互動行為編碼,乃至引入生理同步性測量(如心率變異性耦合)來客

觀量化衝突中的關係系統壓力(Winterheld & Simpson, 2011),從而在更微觀的交互層面打開機制“黑箱”。其次,本研究的因變量局限於“重遊同一目的地的意向”,而旅行衝突引發的心理後效可能存在更廣泛的影響,即是否會泛化至對“共同旅行”乃至其他聯合決策領域(如購置房產)的回避,這有待縱向追蹤設計予以檢驗。最後,研究的文化語境相對單一,未能考察不同文化腳本(如西方“激情逃離”與東方“和諧陪伴”)對衝突感知與後果的塑造作用。一項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將能揭示文化價值觀如何在深層調節整個影響模型,從而極大提升理論的外部效度與普適性。

參考文獻

- [1] Antonetti, P., & Valor, C. (2021). Atheorisation of discrete affect spillovers: An empirical test for anger.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37(7/8), 599-625.
- [2] Baah N.G., & Kim S. (2025).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sustainabl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value (SHTCV) on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7(8), 2918-2938,
- [3] Bolger, N., DeLongis, A., & Kessler, R. C., et al. (1989). Effects of daily stress on negative m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5), 808-818.
- [4]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Basic Books.
- [5] Chen, Y., Zhang, N., & Cheng, X. (2023).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online tourism platform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6] Coffey, J. K., Shahvali, M., & Kerstetter, D., et

- al. (2024). Couples vacations and romantic passion and intimac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Empirical Insights*, 5(1), 100-121.
- [7] Costa, P. T., & McCrae, R. R. (199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 PI-R) an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 [8]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 [9] Fraley, R. C., Heffernan, M. E., & Vicary, A. M., et al. (2011). 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 structures questionnaire: A method for assessing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cross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3(3), 615-625.
- [10] Global Growth Insights. (2026). 全球浪漫旅遊市場規模、份額、增長與行業分析報告. Retrieved February 1, 2026. <https://www.global-growthinsights.com/zh/market-reports/romance-travel-market-103375/>
- [11] Hagen, A. E., Nogueira-Arjona, R., & Sherry, S. B., et al. (2023). What explains the link between romantic conflict and gambling problems? Testing a serial mediational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1018098.
- [12] Hazan, C., &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3), 511-524.
- [13] Hair, J., Hollingsworth, C. L., & Randolph, A. B., et al. (2017). An updated and expanded assessment of PLS-SEM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117(3), 442-458.
- [14] Hair, J. F., Risher, J. J., Sarstedt, M., & Ringle, C. M. (2019). When to use and how to report the results of PLS-SEM.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31(1), 2-24.
- [15] Hossain, M. I., Oppewal, H., & Tojib, D. (2023). High expectations: How tourists cope with disappointing vacatio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62(5), 989-1009.
- [16] Jalilvand, M. R., Samiei, N., & Dini, B. et al. (2012).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destination image, tourist attitude toward destination and travel inten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1(1-2), 134-143.
- [17] John, O. P., & Srivastava, S. (1999). The Big Five trait taxonom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 A. Pervin & O.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102-13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18] Larsen, S. (2007). Aspects of a psychology of the tourist exper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7(1), 7-18.
- [19] Lee, J. S., Fakfare, P., & Han, H. (2020). Honeymoon tourism: Exploring must-be, hy-brid and value-added quality attributes. *Tourism Management*, 76, 103-958.
- [20] Li, F. X., He, C., & Qiao, G. H. (2021). Attributes that form romantic travel experience: A study of Chinese generation Y tourist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4(15), 2130-2143.
- [21] Li, R., Yang, H., & Zhong, L., et al. (2024, December 17). Impacts of tourists' attachment styles on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 attraction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China.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15(6), 1637-1652.
- [22] Liu, H., Li, C., & Xu, H. (2024). Sacrifice for love: The effects of compromise on individual emotional benefits in romantic tourism.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23] McCabe, S., & Johnson, S. (2013). The happiness factor in tourism: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ocial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1, 42-65.
- [24] McNulty, J. K. (2008). Neuroticism and inter-

- personal negativity: The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of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1), 1439-1450.
- [25]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6).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2nd ed.). Guilford Press.
- [26] Minor Hotels. (2025). Minor hotels travel trends report 2026: Travelling deeper: A search for lasting connection. Retrieved February 1, 2026. <https://media.minorhotels.com/en-GLO/258456-minor-hotels-travel-trends-report-2026/>
- [27] Monroe, S. M., & Simons, A. D. (1991). Diathesis-stress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life stress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ressive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3), 406-425.
- [28] Murray, S. L., Rose, P., & Griffin, D. W., et al. (2003). Calibrating the sociometer: The relational contingencies of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1), 63-84.
- [29] Prayag, G., Hosany, S., & Odeh, K. (2013). The role of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satisfaction in understand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2), 118-127.
- [30] Saini, A., Kulshrestha, N., & Yadav, S. (2024).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financial behaviors in romantic partnerships. In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inancial well-being* (pp. 21).
- [31] Servidio, R., & Ruffolo, I. (2016).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 through narratives.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 151-160.
- [32] Smith, M. K., & Diekmann, A. (2017). Tourism and wellbe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66, 1-13.
- [33] Snyder, M. D., Sun, E. R., & Nie, J., et al. (2024). When and how do people share? Attachment anxiety predicts support-seeking strategi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1(4), 1113-1132.
- [34] Soto, C. J., & John, O. P. (2017). The next big five inventory (BFI-2):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a hierarchical model with 15 facets to enhance bandwidth, fidelity, and predictive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1), 117-143.
- [35] Verfueth, C., & Gregory-Smith, D. (2018). Spillover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V. K. Wells, D. Gregory-Smith, & D. Manika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employe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pp. 455-484).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36] Winterheld, H. A., & Simpson, J. A. (2011). Seeking security or growth: A regulatory focus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5), 935-954.
- [37] Zheng, X., Li, J., & Ke, R., et al. (2024).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style and secure priming on implicit altruistic attitu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7(3), 249-260.
- [38] 騰訊谷雨數據. (2021). 90 後情侶在旅遊路上吵崩了, 國慶結束後會有多少情侶分手? Retrieved February 1, 2026. https://view.inews.qq.com/w2/20211003A024RK00?refer=wx_hot&ivk_sa=1023197a.